

## 灣仔進教圍的空間故事：香港城市發展軌跡中的 天主教城市社區<sup>1</sup>

葉鈞頌 鄧永成

[摘要] 本文旨在從地理學的角度，書寫灣仔進教圍的空間故事，探討進教圍的興衰怎樣與香港的城市發展軌跡呼應。有別於社會學的生命歷程和歷史學的口述歷史，地理學的空間故事強調事物的空間性，將無數人的空間實踐寫成敘述，緊扣時間順序和空間設置，分析城市過程。建基於前人研究，本文嘗試豐富對灣仔進教圍的理解。形成於十九世紀中後期的灣仔進教圍是華人教徒聚居的地方。本文描述這個城市社區的日常生活，及其地理景觀在二十世紀歷史脈絡中的轉變，從中揭示在資本主義的城市發展下，灣仔進教圍可以被視為一個案例，用以理解香港土地發展體制的形成過程。

### 引言

甫從列車月台登上金鐘鐵路站的大堂，在出口處走進看不到盡頭的行人隧道，經過十多分鐘的步程，可到達位處灣仔的太古廣場三期。過去近二十年，香港的商業中心區不斷擴張，自中環向東延伸。城市面貌亦配合城市發展的軌跡，添上新元素。原先是金鐘地標之一的太古廣場，也在這擴張過程中延伸到灣仔星街一帶。太古地產在2004年建成了

---

<sup>1</sup> 承蒙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批准查閱及複印教區檔案（版權特許編號：HKCDA-DOC/002/2016），特此致謝。本文部分內容改寫自首作者未出版的本科畢業論文第三章，研究過程幸獲多位匿名受訪者提供寶貴資料，以及英國皇家地理學會香港分會的財政支持，謹表謝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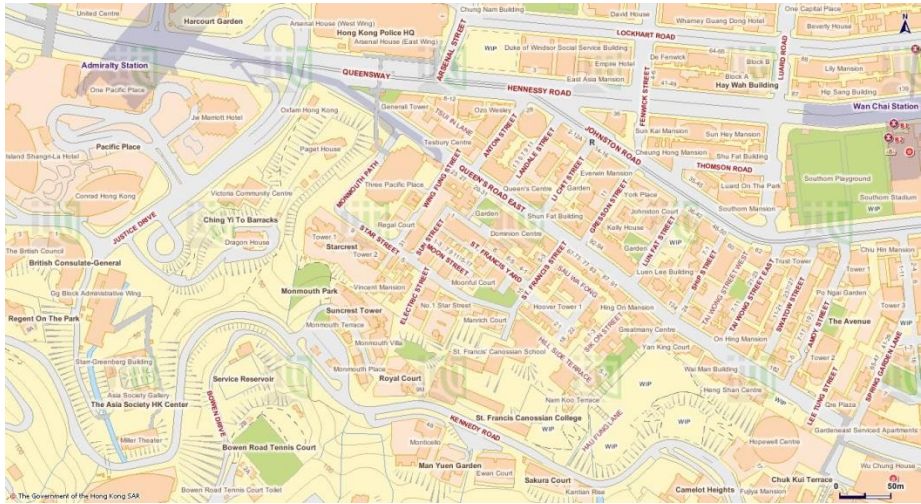
太古廣場三期，以行人隧道為作連接，務求以最具效率的方法連起車站和辦公地點。步出太古廣場三期，便是星街小區。

香港旅遊發展局的網站上，介紹這區為「時尚餐飲娛樂集中地，由日街、月街、星街及永豐街組成，並以太古廣場三座為中心」。太古地產先後花上十多年時間，在星街購入土地，在1999年建成星域軒，再建起廣場地標，繼而在2008年參與特區政府發展局與市區重建局轄下活化灣仔舊區專責委員會的競投，以公私營合作的形式，引入藝廊、咖啡室、餐廳和豪宅，用高檔文化及中產生活方式的蘇豪區包裝，將這一帶打造成星街小區<sup>2</sup>。

在星街小區裏，有一座樓高四十二層、座落於星街一號的豪宅，地面外牆寫上「天主教聖母聖衣堂」，這個堂區曾經是殖民地初期天主教會在維多利亞城內建立的首三個堂區之一，如今成為了香港首個位於私人屋苑內的天主教聖堂，佔用這座豪宅的地下、一樓及閣樓。以聖人命名的聖佛蘭士街（St. Francis Street）和進教圍（St. Francis Yard），只成為地圖上的線條，幾條街道的名字而已（圖一）。大抵沒有人可以想像得到，在近百年前，此處是何等熱鬧繁盛的天主教社區。2016年，是天主教紀念香港開教一百七十五周年及教區成立七十周年，在向本地人的傳教史中，進教圍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城市的歷史，只有書寫下來，才不至於淹沒在發展的洪流中。

---

<sup>2</sup> Lee, J.W.Y. and Tang, W-S., “The hegemony of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Re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Institution or Community’ (G/IC) land in Hong Kong”, in *Urban Studies* (2016, doi: 10.1177/0042098016679607).



圖一：灣仔進教圍的位置圖（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地理資訊系統<sup>3</sup>）

## 空間故事的重要性

「空間故事」（spatial story）是本文的研究方法論。在地理學中，空間長久而來是最核心的概念，近年不少地理學家主張社會關係塑造空間，於是深入研究社會—空間過程，掌握社會個體和群體怎樣與空間互動<sup>4</sup>。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地理學家之一David Harvey致力於發展「歷史地理唯物論」，其中他主張空間生產是資本累積的過程。Harvey提出以「城市過程」（urban process）來理解社會關係在城市空間參與資本累積的過程<sup>5</sup>，並在其新書中<sup>6</sup>，再度發表這個看法，認為即使過了三十多年，尤其近年全球出現資本過度累積的危機，這理論仍然能有效地理解

<sup>3</sup> 地圖取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地理資訊系統（<http://www.map.gov.hk/>），版權由政府擁有。

<sup>4</sup> Zieleniec（2007年）提供了一個頗為全面的理論綜觀，見：Zieleniec, A. J., *Space and Social Theory*. (SAGE, 2007).

<sup>5</sup> Harvey, D.,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78, 2(1-4)), pp. 101-131.

<sup>6</sup> Harvey, D., *The Ways of the World*.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資本在建成空間的角色。簡而言之，空間有三層意義，第一層是物質性的絕對空間（absolute space），有可客觀描述的位置及邊界；第二層則是有社會關係的相對空間（relative space），社會關係出自不同社會角色對空間的各種使用、價值、需求、利益和定義；第三層是關聯空間（relational space），由許多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s）和空間過程（spatial processes）所生產出來，一方面是社會內資本與權力關係的角力，另一方面是個人在空間的經驗和想像。城市過程與這些空間的意義密不可分，而三層意義並非獨立，而是互相影響及連繫<sup>7</sup>。雖然與Harvey的基本主張一致，我們更強調城市過程需要置於本地尺度的特定時空及發展軌跡中理解，故在應用相關理論來把香港的城市過程置疑化（problematisation）的同時，需運用空間故事的方法論。

有別於社會學的生命歷程和歷史學的口述歷史，我們想嘗試建立地理學的方法學，強調以空間為本位的故事，將人地之間在時代洪流的互動寫成「空間故事」，亦是建基於無數人的空間實踐所建構而成的歷史地理學。一個地區的空間故事，由大量在該區內外生活的人的空間實踐所構成<sup>8</sup>。空間故事不是描述性的敘述，其書寫過程重視空間性，以指出來自空間實踐的矛盾，涉及空間的權力及資本關係，透過把時間順序和空間設置緊扣起來，分析城市的過程。當下的城市過程往往被簡化成量化的數字或符號，歷史的宏觀敘事亦僅以單一經濟社會發展為軸心，忽略了城市發展是無數的人以日常生活建構而成。我們透過空間故事的形

---

<sup>7</sup> 鄧永成、王潔萍、文沛兒，〈城市的地理考察：以「空間故事為師」〉，原載《灣仔社區地圖集》（香港：雅集出版社，2008年），頁1-11。

<sup>8</sup> 鄧永成、王潔萍，〈城市重建的空間故事：香港荃灣七街重建項目的真實紀載〉，陳映芳等合編，《直面當代城市：問題及方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7-49。

式來表述城市知識，是要強調社會角色與其身處環境的互動，怎樣在時間和空間的維度上交織。

灣仔位於維多利亞城的邊陲，是華人的聚居處。在本地傳教史中，灣仔早在十九世紀已是華人教徒的集中地。綜合現時已有的歷史敘述，可知星街一帶當時已被稱為「進教圍」，華人教徒的社區位於聖方濟小堂四周，聖佛蘭士街亦因而得名。二戰後，該處則建有煉靈堂，後易名為聖母聖衣堂，在1970、80年代，進教圍的興盛已不復再。在1997年，教區和長江實業達成協議，將聖母聖衣堂拆卸重建，新堂建於星街一號的地下兩層，於2001年祝聖啟用。不過，很多過程和細節都未被研究。本文透過書寫進教圍的空間故事，旨在探討其興盛與隕落怎樣呼應香港的城市發展軌跡，從而豐富對本地傳教史的理解，也從地理學角度揭示香港土地發展體制的形成。下文先建基於夏其龍的歷史考證<sup>9</sup>，略述天主教會在香港十九世紀的歷史地理，繼而帶出灣仔進教圍在什麼背景下形成。然後，本文藉歷史檔案及訪談，探討二十世紀灣仔進教圍經歷過的興衰，以及其與香港城市發展軌跡的互動。

### 當天主教會帶同資本來到香港（以及灣仔）……

英國人在1841年1月佔領了香港，香港成為殖民地後，英國人在香港島現今中上環及金鐘一帶發展起維多利亞城。歐洲文化以史無前例的速度改變香港的華南文化地景，不僅改變城市景觀，也帶來了西方宗教。西方傳教士遠洋而至，例如英國國教聖公會在殖民地成立後不久，即在維多利亞城的中心興建聖若翰座堂，展開主要面對洋人的牧養工作。

---

<sup>9</sup> 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香港：三聯書店，2014年）。

天主教教廷在英國人佔領香港僅三個月後，隨即宣布將香港島及周邊的地區劃成傳教區，級別為宗座監牧區，獨立於1576年成立的澳門教區。由於在十九世紀的訊息傳達不如今日迅速，當時的駐華總務長若瑟神父（Fr. Theodore JOSET）在1842年初接到命令後，隨即從澳門趕到香港開展工作。英國殖民者一來到香港就已宣布所有土地都是皇家土地，代表所有土地都屬政府所有，除了在1846年建成的聖若翰座堂<sup>10</sup>。政府應若瑟神父的要求，撥了兩塊威靈頓街的土地給他。雖然若瑟神父得到了土地，但若要在其上建築，卻需要資本。若瑟神父於是賣掉了在澳門的一些教會物業用作套現，建成了聖堂和三層高的物業。過了不久，若瑟神父就在1842年8月，以三十八歲之齡去世了。

接替他擔任駐華總務長和香港暫代監牧的是方濟會會士裴神父（Fr. Antonio FELICIANI）。裴神父上任不久，意識到傳教區的運作及擴張需要大筆資金，除了透過來自普世教會的捐款和資助以外，裴神父亦致力投資房地產。據夏其龍的考證<sup>11</sup>，裴神父任內不斷忙於處理物業投資的事宜，透過購入房屋、商舖和貨倉，再出租獲利。裴神父的不少投資都集中在灣仔。就在他上任不久，裴神父已經在灣仔星街毗連的「萬茂里」一帶建立墳場<sup>12</sup>，應付當年極高的死亡率。在墳場方面的投資，為傳教區每年帶來可觀及穩定的收入。他在墳場附近建了一些房屋，包括於1845年在墳場附近海邊購買了土地和建築物，又沿皇后大道興建一些唐樓以出租獲利，另外也興建了修院和醫院。當時的灣仔，特別是海邊的土地價值甚高，因為香港是自由港，政府不徵收進出口課稅，故當時

---

<sup>10</sup> Goo, S. and Lee, A., *Land Law in Hong Kong*. (Hong Kong: LexisNexis Butterworths, 2003).

<sup>11</sup> 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香港：三聯書店，2014年）。

<sup>12</sup> 有關墳場的具體位置及當時維多利亞城的街道圖，可參考政府早年出版的地圖集，見：Empson, H., *Mapping Hong Kong: a historical atlas*. (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1992).

的經濟結構以貿易為主導，而城市發展呈現了有利貿易的空間形態。維多利亞城的沿海用地都是碼頭，供商船停泊。在維多利亞城的規劃中，港島北岸的海旁地段被規劃成碼頭、貨倉及商業用地，亦是最早拍賣的地皮<sup>13</sup>。裴神父在殖民地初期，購入灣仔海邊土地，是有助於加速資本累積的長遠投資。而且，根據夏其龍的考證<sup>14</sup>，那片土地後來確實曾出租予別人作貨倉之用。

1846年，在墳場附近興建了第一所聖方濟沙勿略小堂。墳場運作至1848年已告爆滿，然後搬到現在的跑馬地天主教墳場。當時，除神職人員之外，法國的聖保祿仁愛會修女亦來到香港服務。她們在1848年來到香港，起初在現今進教圍附近的山邊棚屋安頓下來，七個月之後才在同區接近小堂的地方，找到較好的地方和開辦收容所拯救棄嬰<sup>15</sup>。1851年，裴神父把墳場附近、位處皇后大道的海旁土地和建築物，租予聖保祿修女。兩年後，裴神父想乾脆將這些土地轉讓予這些修女。正值物業市場升溫，傳教區希望盡快賣掉那物業。事實上，傳教區甚至把灣仔的聖方濟各醫院出租予英軍，以賺取租金來紓緩香港天主教教會的財務困境。1859年，威靈頓街重建中的聖堂發生大火，把整座聖堂燒燬了，當時的監牧盎神父（Fr. Luigi AMBROSI）急需更多資金。盎神父決定運用權力，將聖保祿仁愛會的收容所移離海旁，安置於現今星街，又安排來自意大利的嘉諾撒修女來港服務，最後更導致意大利神職與法國修女間的物業糾紛及衝突。

---

<sup>13</sup> 李慧瑩、鄧永成，〈城市空間與廣東文化〉，文潔華編，《香港嘅廣東文化》（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161-177。

<sup>14</sup> 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香港：三聯書店，2014年）。

<sup>15</sup> 申頌詩，〈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1848-1998）〉，夏其龍及譚永亮合編，《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年），頁7-77。

1864年，盎神父在今日的光明街位置新建了一所小堂，取代原有的那座舊堂。那幅土地是由港督砵甸乍撥給教會，而教會不需繳納任何地租，三千元的建堂經費則從菲律賓籌得。教會在小堂附近建了些房屋供教徒居住，這些屋屬於堂區管轄。灣仔的進教圍自此興起，範圍就是今日星街、聖佛蘭士街、光明街一帶。

與此同時，在與廣東的傳教士協商後，傳教區的範圍在1860年代擴展到九龍一帶，教會亦在西貢展開傳教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傳教的空間形態，由於鄉村的村民生活空間相對較小，通常只集中在自己的村落，以及村落之間的墟市，故傳教士在鄉村傳教時，會在村內設立聖堂，然後村民的生活就以聖堂的宗教生活為中心，例子包括西貢鹽田仔和馬鞍山村。雖然現今城市的生活節奏和空間形態與鄉村大為不同，城市人通勤頻繁，生活空間較大，不過，十九世紀的交通網絡和基建未成形，現今的大城市生活節奏直至二十世紀初才算形成，所以在這個比較之下，灣仔的進教圍可以理解成傳教士在城市傳教模式的探索。

### **發展中的城市，城市中的進教圍**

1867年，就在新的聖方濟小堂落成後三年，盎神父病逝。接任的高神父（Fr. Giovanni Timoleone RAIMONDI）在1874年成功爭取香港升格為宗座代牧區，領域再擴展到新安縣和惠陽縣，他本人亦被祝聖為領銜主教。當時維多利亞城的三個天主教教徒群體分別在三所教堂聚會，分別是葡萄牙人的威靈頓街總堂，英國人的花園道聖若瑟堂和華人的灣仔聖方濟小堂。前兩者位於維多利亞城內，而後者則位於維多利亞城邊陲，即是較窮困的華人和葡萄牙人聚居的灣仔。



城市一直發展，永不停步。隨着城市發展的需要，維多利亞城對穩定的電力產生需求，開始研究供電的可能性，例如以電街燈來逐漸取代原來的煤氣街燈，另外也要供電予山頂的居民。1888年香港電燈成立，覓址興建香港首家發電廠。考慮到發電廠是高污染的土地利用，自然不會選址城內，最終在1889年決定在維多利亞城邊陲，即是在灣仔興建發電廠。選址在現今星街及電氣街交界。除發電機之外，發電廠亦建有員工宿舍和辦公大樓等。日、月、星街，光明街及電氣街亦因而得名。由此可見，進教圍一帶的街道名，除了具宗教元素外，也象徵了歷史發展。隨着電力需求增加，灣仔供電量供不應求，加上銅鑼灣和跑馬地一帶亦開始發展，就連聖保祿修女的工作亦逐漸向東面擴張及搬遷，香港電燈最終選址北角另設更大規模的發電廠，而灣仔發電廠則在1922年關閉並拆卸。1915年，置地公司購入聖保祿修女在灣仔的土地，兩年後發展成蘭杜街及晏頓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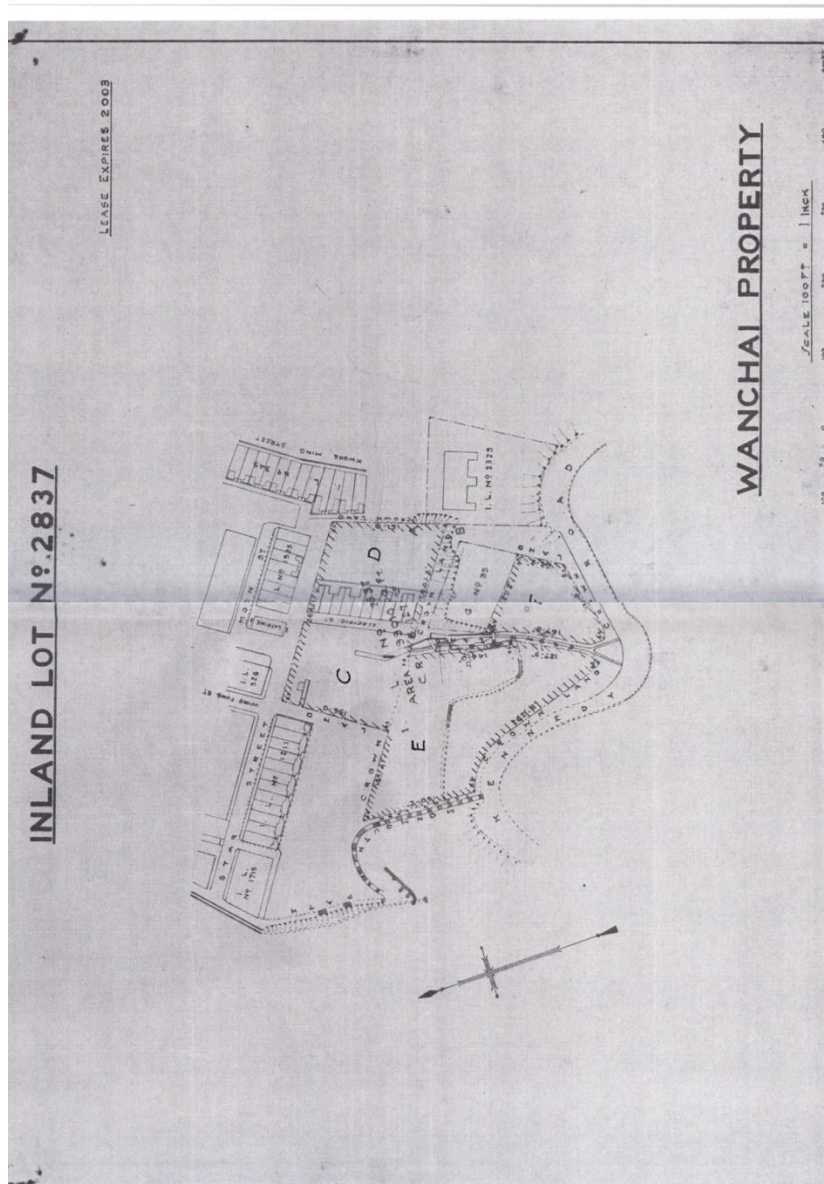
正如城市的發展永不停步，教會的發展也永不停步。1870年代，嘉諾撒修女在進教圍建立修院團體，同時辦學及提供醫療服務。據教區檔案處的統計數字，由1867年到1895年的香港的教徒人數不斷增加，由4,100人增加至8,315人，在約三十年間增加逾一倍。由於年代久遠，現時沒有辦法取得當時灣仔的教徒數字。在1922年，發電廠拆卸之際，聖方濟小堂也同時拆卸。現在沒有資料準確記載拆卸小堂的原因，只能知道後來教會需借用現今星街及堅尼地道之間的嘉諾撒修院地下舉行感恩祭。但是，我們憑有限的檔案紀錄作出大膽的推測，聖方濟小堂的拆卸，是因為教會想將灣仔及其以東的地區集中管理。跑馬地聖瑪加利大堂在1922年動工奠基，1925年落成，灣仔小堂其後變成附屬於跑馬地的一個彌撒中心。更有力的證據是，聖瑪加利大堂的主任司鐸是司徒廷昭神父，而他本來是灣仔聖方濟小堂的主任司鐸。而原來小堂的地皮，則

重建為房屋。按傳教區當時的投資決定來推斷，當年拆卸那小堂，有很大可能是為了套現來建其他聖堂。

教會也許很快就發現當時拆卸小堂的決定缺乏長遠視野。1932年6月1日，小堂的新任神父理雅各（Fr. James ZILIOLI）上任。他就任不久就發現灣仔是相當窮困的地方，人口密度高，生活空間很擠逼，尤其有很多小朋友。他又發現到小堂空間不足。灣仔的教徒數目一直有增無減，連拆卸前的舊小堂也不敷應用，根本不可能把參與主日感恩祭的教徒全塞進嘉諾撒修院的地下。對此，他採取了兩個空間策略。第一，由於善會及兒童的活動空間不足，他向嘉諾撒修女借用修院空地作活動場所。第二，由於地下小堂空間有限，只能容納一百五十人，他只好向當時的宗座代牧恩理覺主教（Bishop Enrico VALTORTA）申請，每主日加開幾台感恩祭。不過，這些策略都無法有效紓緩問題。對理神父和進教圍教徒來說，他們渴望籌建新聖堂，但他們既沒有空間（土地），也沒有金錢（資本）來興建新聖堂。於是，作為教會成員，他們透過祈禱的宗教方法來祈求有新聖堂。正值當年教宗庇護十一世鼓勵教徒為煉靈祈禱，進教圍的人就自1934年10月煉靈月起，集合在小堂為煉靈祈禱。表面上，這體現出進教圍教徒對天主的信德，但從世俗的觀點來看，理神父和進教圍的教徒實際上以祈禱，在小堂這個空間裏展現他們的集體意志，更甚者可理解成抗爭手段，而他們當然不會直接給予傳教區壓力。顯然，恩主教感受到進教圍及灣仔教徒的決心，在1936年11月2日，親自到進教圍與教徒一起為煉靈祈禱並奉獻感恩祭，並且答應在灣仔成立一個堂區。當天，進教圍的神父和教徒一共奉獻了十三台感恩祭。

恩主教委派副主教戴遐齡神父（Fr. Antonio RIGANTI）處理買地事宜。根據教區檔案，當時戴神父屬意發電廠的遺址，即星街的土地。故

此，戴神父與港燈商量購地事宜。港燈於1937年5月28日以信函回覆，並夾附一張地圖（圖二），展示港燈當時在灣仔擁有的資產，即內地段2837。港燈將內地段2837分拆成C、D、E、F四個部分，面積分別為19,700、14,500、35,800和17,000平方呎。戴神父最終選定了面積最小的D部分，佔地14,500平方呎。港燈當時開價每平方呎\$4，而戴神父討價還價，最終以呎價\$3.3，亦即以\$47,850的價錢，在1939年12月3日成交。然而，雖然交易由傳教區促成，但非由傳教區完成，而是由堂區完成。其中一個可能原因是傳教區受1920、30年代的全球經濟大蕭條影響，面臨財政危機，甚至要向教廷提出請求，調動資金以應付傳教區日常開支。當時一位進教圍的熱心教徒黃順英女士，慷慨地付出這筆錢來買下地皮，事後亦未曾要求教會還錢。部分現存歷史敘述忽略了這幅土地的歷史，亦有部分誤把這塊土地當成原為教徒擁有的地皮。



圖二：港燈1937年5月28日致戴神父回函夾附的地圖

（圖片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為了更了解當時情況，本研究訪問了黃順英的一位親戚。這位匿名訪問對象1930年代在香港出世，現在已達八十多歲高齡。她兒時與黃順英一起在灣仔生活。她說：

*「她（黃順英）和她丈夫與英國人做單車生意。她在二戰前在進教圍一帶買了不少物業，其中有一間屋是三層的，地下是她做生意的地方，樓上分別是她和我家的居所。她在打仗前，已經捐了一筆錢給教會去買星街的地。」<sup>16</sup>*

灣仔是窮困地區，進教圍內這麼富有的人少之有少。即使教會得到了土地，也要想辦法籌募建築費。恩主教在土地成交後，很快就草擬了一篇文稿，打算廣邀社會賢達捐款支持。他在1940年1月29日寫成初稿，當中寫到：「I wish to appeal to you on behalf of Wanchai, the poorest but perhaps the most fervent of the Catholic parishes in Hong Kong.（我謹代表灣仔—香港所有天主教堂區中最貧窮但或許是最熱烈的一個—向你們作出呼籲。）」他形容灣仔為slummy（貧民區），又提到將在聖堂內設有會所，供小孩聚腳。他又說「I hope to invite you, in (I trust) about a year's time, to the opening ceremony.（我希望邀請你們在（我相信）一年間來到開幕典禮」。有人，可能是主教身邊的幕僚，建議將第一句改為「I wish to appeal to you on behalf of the children of Wanchai, the poorest district perhaps in Hong Kong.（我謹代表香港最貧窮的地區灣仔內的兒童向你們作出呼籲。）」另一方面，有人也建議主教不要以牧函的形式發信，而改以籌款呼籲形式，才可以吸引社會更多人留意。

---

<sup>16</sup> 黃順英親戚訪談錄，2016年3月5日。

最後，恩主教在2月11日發出定稿。第一段就提及灣仔窮困的生活情況，包括以「poorest among the poor（貧窮中的最貧窮）」、「slums（貧民區）」等字眼來形容灣仔，又形容到灣仔的居民三餐不繼，流離失所。他在信中又說，灣仔區有近三千個教徒，他們急需有一座聖堂，故此邀請香港教徒捐款支持。當時正值四旬期，所以也算是一個合適募捐的時間。當時進教圍內的人都滿心期待有新聖堂，可惜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1941年日據時期開始，建堂工作被逼暫停，不少教徒更加到中國大陸走難。經過三年多的日據時期，香港需要回復起來。戰後，香港的天主教會在1946年升格為正式的教區，在主教領導下運作。

不少教徒隨戰事平息，回港後亦返回進教圍。黃順英的親戚也在日據時期逃難回中國大陸：

*「走難完之後，我在1946年返回香港，見到自己原本住的那間屋被別人霸佔，唯有在進教圍內另找其他地方居住，也無辦法，畢竟戰後很多人都沒地方居住，又不能住回自己本來的居所。」<sup>17</sup>*

受訪者指出，黃順英本人則在日據時期到了澳門避難，也是在戰後回到進教圍，不過丈夫就不幸在戰亂期間被日軍捉去，自此失蹤。

進教圍的教徒戰後更加窮困的生活，無損他們籌建聖堂的決心。他們亦依然重視宗教生活，當年約十歲的受訪者表示，每天都會和進教圍內的街坊到聖堂參與感恩祭，亦加入了善會天神會。受訪者稱，天神會的對象是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十四歲以上的女孩加入天神孝女會，男孩

---

<sup>17</sup> 黃順英親戚訪談錄，2016年3月5日。

則加入天神孝子會，又形容天神會就好像目前的主日學，而天神孝女會和天神孝子會則類似主日學導師。

An Urgent Appeal  
of H. E. Bishop Valtorta  
to All Catholics of Hong Kong,  
for contribution towards the  
Building Fund of  
"THE HOLY SOULS' CHURCH"  
in  
Wanchai

Even before my arrival in Hong Kong I had the pleasure to receive some very encouraging reports about Wanchai, which I could afterwards actually see by myself that they were true. There is to be noticed all over Hong Kong a general and most praiseworthy effort to improve the city's conditions and repair the ruins of the black years of enemy occupation. Catholic efforts for their associations, their churches and their schools do most certainly not remain behind, rather they are even more to the front. But by far the greatest effort I have noticed is the effort of the Wanchai Catholics to build their Parish Church. It is something quite unique. It touches one's heart to compare the magnitude of the Catholics of Wanchai with their miserable economic condition.

It is known to all that Wanchai has always been numbered amongst the very poorest quarters of the town and is perhaps the poorest of them all. In addition, it has very greatly suffered, and perhaps more than all other districts, from bombing and shelling and war destruction. How many of its inhabitants have died during the war, nobody will ever know and I am afraid nobody cares to know. Hardly a day passed without some bodies being found in its desolate streets: bodies of poor people, of whom I am myself a witness that they had to die of starvation. Now, the war over, what was left of the pre-war population has somewhat revived and has even been greatly swelled by the arrival of other poor from neighbouring places. There are no houses to accommodate them but all empty spaces, streets and broken abandoned buildings are full of street-sleepers. Amongst this vast crowd of poor, there is in Wanchai a pretty large number of Catholics, perhaps 1,600. They share the common lot of being the poorest amongst the very poor. Yet, though so poor, they have taken up again the idea to build their Parish Church. It is an old idea, which was put forward over 22 years ago and was painfully but steadily pursued till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and it now pushed on with renewed vigour. The Wanchai Catholics have very good reasons for doing so, for, although their number is over 1,500, they have no Parish Church yet and need one very badly. The only place of worship which they now have is the Chapel of the Canonian Convent of Wanchai. But it is ridiculously inadequate, as it has accommodation for 150 people only. The Wanchai Catholics are good Catholics and therefore go to Communion by hundreds and hundreds every Sunday, but in order to do so, they are obliged to march in file inside the Church to the altar railing, receive Holy Communion and immediately march in file out of the Chapel and leave the place to others that are awaiting outside. The case of the Wanchai Catholics is thus an extremely deserving one: most certainly they need a Church.

Now, they have got the site: it is not a pretentious one, but it is there, and that is something. Besides, they have collected a sum of over 80,000 Hong Kong dollars, and that is something, too. Not that the Wanchai Catholics could ever raise this sum by themselves, but, in view of their good will and as a result of their prayers, people have already come to their help. I am deeply moved, and now I wish to say "let us start the work!" But, in spite of my ardent desire, I dare not; we are still by far too much behind what is required to build even a very modest Church. Therefore, instead of saying "let us start the work" I can only say "let us make another effort!" We must get near at least one half of what we need before we can actually dare to start and succeed. God wills it. Were the Catholics of Wanchai relying only on their material efforts, I would myself lose hope; neither would I ever dare to appeal again to the charity and good-will of others to come forward to help them. But the Wanchai Catholics are not relying on their efforts, but put their trust in God; they

are praying and praying and doing penance and fasting in order to obtain from God that their Church should materialize.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 feel in duty bound, not only to help them myself to the utmost of my personal possibilities, but also to ask others to help. I believe it would be a shame to refuse our help to such a worthy cause, to stand aside and do nothing when we see our brethren go even fasting in order to forward the building of their Church. How can we fare in their comparison before the Lord, our common Father? Therefore I trust that all our Catholics and all our Catholic bodies and institutions will not refuse to listen to my earnest invitation. Let us all make another effort in favour of the new church for Wanchai and then we will actually start the work and rely on God to bring it to conclusion. We have only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the poor: it is always the poor who are setting the example to the rich how to be generous, because they always give something, i.e. their prayers and also, whatever material help they can afford. A poor old woman, sick and forsaken by her relatives, and without even a house to live in, has offered \$500.00 towards the Holy Souls' Church Fund. When asked how, being so poor, she could offer so much, she replied that she had sold her golden ear and finger rings, to make sure that after her death some good souls would pray for her. Wonderful example, indeed! Were we all to join the poor Catholics of Wanchai in their prayers and in their giving, the building of the new church, and I mean not only the starting of the work, but the actual completion of the building, would be a matter of only a few months.

The new church is to be dedicated to the Holy Souls. Special prayers will always take place in it for the souls: every Monday a Mass will be said there in reparation for the Souls and for all Benefactors. How could we suppose that the Holy Souls will let themselves be vanquished in generosity. On the contrary, we may rest assured that they, the suffering branch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ill always be on the alert and stand by us, the militant branch, in order to help us until we all together join the triumphant Church in Heaven. Many saints were used to say that they were never disappointed whenever they asked for graces through the intercession of the Holy Souls.

A feature of the new church will be the commemorative tablets that will appear on the walls of the building with the names of those for whom they are intended. For the comparatively light contribution of 500 dollars we can have the right to one of such tablets. Here is, then, a practical suggestion. Instead of erecting costly monuments to the memory of our dear ones in cemeteries where few are wont to go and pray, it would surely be better to have their names on tablets in a Church, where they will be daily before our eyes and thus their memory will be always present to us and prayers will be always offered for them. It is a sad thing to say that we seldom visit our cemeteries and the monuments of our dear ones; but such is the fact. It cannot be so in a church.

In conclusion, let us all join hands and help. Perhaps we can give but little, for there are other poor in Hong Kong besides those of Wanchai. At least we may give our prayers, and offer our daily sacrifice, or mortification, to God in union with the prayers and mortifications of our brethren of Wanchai, trusting without doubting, that the good Lord will hear us. And let us be assured that we shall soon have in Wanchai the much-needed Church of the Holy Souls.

Hong Kong, 15th October, 1947.

Hency Valtorta,  
Bishop of Hong Kong.

圖三：恩理覺主教戰後重啟煉靈堂籌款計劃的呼籲（圖片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1947年10月，恩主教重啟建堂籌款計劃（圖三）。受訪者形容了當時的籌款情況：

「那時聖堂籌款建築新聖堂，我們幫忙籌款，神父叫我們每人拿一本簿，站在聖堂門口叫人捐款，記下捐款人的姓名。」<sup>18</sup>

1848年，理雅各神父也製作了一張單張，以中英雙語，邀請教徒捐款。他在單張上印製了當時的建築圖則（圖四），可見當時的設計頗為宏偉。事實上，這個由K. C. Chiu & Co.和Y. H. Ho設計的圖則已經得到政府工務司批准，只要一有經費，可以隨時動工。



圖四：理雅各神父發出的籌款呼籲（圖片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sup>18</sup> 黃順英親戚訪談錄，2016年3月5日。



不過，由於這個設計初稿過於宏偉，價格高昂，最後有必要簡化設計成最終面貌。最後的建築費用達三十萬二千元，而進教圍教徒相當努力去籌募經費，又向一些學校籌款，例如華仁書院透過義演話劇籌得五千元，又得喇沙書院、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及聖保祿書院等學校捐款支持，最終進教圍及灣仔教徒籌得的款項為十六萬七千元，餘款則由教區墊支，可見該聖堂的建築開支超過一半由進教圍及灣仔教徒承擔。1949年2月底，工程開展。又在1949年9月舉行奠基禮。1950年7月，煉靈堂祝聖啟用。1951年9月，基立學校開辦。而到了1957年，煉靈堂易名為聖母聖衣堂。

聖堂建築樓高五層，聖堂及神父宿舍位於四、五樓，地下數層則是會所和基立學校。會所幾乎每晚都有善會聚會及教徒團體活動。受訪者描述了首次踏足新落成聖堂的經歷：

*「我第一次踏進那間聖堂，就是祝聖禮。那天很熱鬧，有很多人，大家都很开心地慶祝，還有聖母像在進教圍內出遊。我本身很喜歡打籃球，建築物外有個籃球場，那個籃球場上的第一場球賽，就是由我落場打的。」<sup>19</sup>*

至於建堂後的生活，受訪者形容：

*「星街全部都是數層高的矮屋，那時進教圍內住滿教友，街上有不少小販。每逢主日和慶日，聖堂內都會有很多人。進教圍整體*

---

<sup>19</sup> 黃順英親戚訪談錄，2016年3月5日。

給我的感覺是無分彼此，相處融洽。那時我很喜歡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留在聖堂玩，特別是那個會所。」<sup>20</sup>

一位受訪的神父亦描述兒時在進教圍生活的情境，他形容進教圍的生活都以聖堂為中心，經濟活動除小販外，更令他難忘的是有人在進教圍內養雞<sup>21</sup>。

聖堂落成後，1953年發生了程野聲、魏蘊輝兩位神父被殺的案件，為進教圍教徒帶來沉重打擊，真相至今未明。除此以外，往後的發展就如受訪者所描述般順利。教徒在進教圍內安居樂業，又有充裕的空間渡過宗教信仰生活。不過，城市依然繼續發展，資本在城市中仍然不斷尋找空間，固定下來，繼續累積與循環，永不止息。

### 土地發展體制對進教圍的影響

當聖母聖衣堂和基立學校在1950年代建成後，為進教圍及灣仔提供了宗教和教育的生活空間，進教圍自此成為了一個健全的天主教城市社區。基立學校不僅開辦上、下午校，也有開辦夜校。上午校是私立學校，下午校則為津貼學校。一位在1960年代入職基立學校的老師在描述當年的進教圍時說：

「那時候的人相熟，鄰居也很混熟，不用關上家門。那時我每天路經進教圍中，雖然不會見到明顯的十字架標記，但教友走過碰

---

<sup>20</sup> 黃順英親戚訪談錄，2016年3月5日。

<sup>21</sup> 一位在灣仔進教圍長大的神父訪談錄，2016年4月6日。

面，都能叫出對方的名字，又會打招呼，說自己煮了什麼餸菜，  
晚些拿點給你。」<sup>22</sup>

然而，這種社區的生活只維持不太長的日子。這位受訪的老師憶述，約在1970年代，進教圍內有發展商收購物業，很多教徒由於舊樓清拆而搬離進教圍，遷到其他地方居住，不少學童亦隨父母遷至其他地區轉校讀書，令基立學校的學生人數銳減，與入職初期比較，每天生活的進教圍亦已大為不同<sup>23</sup>。

我們主張，由政府主導和由發展商落實的土地發展體制在1960年代開始形成<sup>24</sup>。自從上世紀60、70年代香港的房地產市場與金融股票市場掛勾後，以地產發展商為首的華資得以進入過往被英資主宰的金融市場大展拳腳，容易地在市場上集資。這樣不單令地產資本更集中，累積過程更快，促進房地產市場急速發展，令政府在土地方面的稅收增加，甚至成為政府最大的收入來源，使房地產有能力左右香港經濟命脈。

土地發展體制有兩個特點值得我們留意，第一是政府主導，第二是地產發展自殖民地初期已主導社會。如前所述，英國殖民政府將香港的土地都納為皇家土地，而在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之前，英國殖民者早已在1841年進行首次賣地。回顧香港的殖民史可以看到，政府壟斷香

---

<sup>22</sup> 前基立學校教師訪談錄，2016年3月5日。

<sup>23</sup> 前基立學校教師訪談錄，2016年3月5日。

<sup>24</sup> Tang, W-S., “Hong Kong under Chinese sovereignty: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 land (re)development regime”, in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8, Volume 49 Issue 3), pp. 341-361. 及 Tang, W-S. & Yip, K-C. M., “Unchallenged land (re)development regime and everyday life of residents in high-density Hong Kong”, in *Towards an Inclusive City: Practices in East Asia*, edited by Jeon, H.G. (Kyoto, Japan: Horitsu Bunka Sha, 2016), pp. 92-103. (in Japanese).

港的土地後，為了令政府運作的有效性先於資本累積的邏輯，政府一向都善於因應時移世易，配合市場而改變土地政策。

另外，房地產發展長久以來已主導香港社會。上文從地理空間角度闡述傳教區發展史時，已強調不僅發展商，就連教會都長期牽涉在房地產買賣及投資當中。在1960年代，股票市場及房地產市場掛勾後，房地產買賣更普及到一般市民身上。在個人層次，當市民手上一有餘錢，如在股票市場獲利，就會將資金再投資到房地產市場，反之亦然。與此同時在城市社會的層次，為了準備在股票市場取得資本以擴張，房地產市場要透過不斷的商品化，增加地產單位的銷售量，以提高年度總帳的利潤率。

當時，進教圍亦無可避免被扯進土地發展體制之內。進教圍的舊樓引來發展商垂青，將這區重建。把三層高的舊樓房，重建為新式洋房。現存的例子包括光明街的澤堂樓（1975年落成的六層物業）、進教圍的寶豐大廈（1978年落成的十三層物業）、月街的月星樓（1975年落成的六層物業）和日街的日新樓（1972年落成的六層物業），儘管一些進教圍內的三層舊樓房仍保存在區內，例如月街13號、聖佛蘭士街7號和8號。在該區定居多年的教徒因重建而遷出，亦有不少外來的人遷入，天主教城市社區的色彩漸漸褪色，進教圍的光景亦不復再。

直至1980年代，進教圍及灣仔迎來更大的改變。這土地需求及供應的改變一方面是由於1970年代末香港的工業活動大規模地遷移到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另一方面是因為香港地產發展商要求政府每年供應可發展的土地後，政府自此成立土地關增特別委員會及後續政策調整等等的回應。中國與英國在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標誌着當時香港殖民地的狀態快要終結。這代表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國際談判終結，也

意味即將在較低層次展開政策博弈。不論對中國還是英國，當時也有逼切需要去維持經濟的繁榮及社會穩定——共識就是視房地產業為經濟乘數。然而，中國政府限制香港政府每年的賣地上限為五十公頃，而香港政府就透過市區重建及填海來擴大土地供應。

自從1980年代合和中心在灣仔落成後，胡忠大廈及多座商業樓宇亦相繼落成，象徵香港的商業中心區已由中環擴展到灣仔，因此，灣仔的地租顯着提升。如前所述，土地買賣受限制，政府為了繼續穩定土地供應，經過發展新市鎮的階段後，採取了回到海港的空間發展策略。1980年代，政府發表《全港發展策略》，及後數年間作出修訂，提出《海港及機場發展策略》和《都會計劃》，基本上奠定市區重建的重要地位。1980年代末由政府成立的土地發展公司，把香港島的市區標籤為城市衰落的地區，而灣仔更被標籤為九個最衰落的地區之一。自此，城市景觀因市區重建而變得截然不同，發展商透過改造城市的建成空間來賺取收益。

進教圍一帶亦是發展商的心頭好。故此，剛在1970年代經歷過重建的進教圍，再一次於1980、90年代重建，包括1989年落成的星街7號永星苑。其中，太古地產更投放超過十年時間，在星街及進教圍一帶購入土地，發展起豪宅及商廈。教會服務的發展亦受挫，基立學校的教師和學生越來越少。根據教區檔案處的統計數字，在1992學年，基立學校只有9位老師（5位教徒，4位非教徒）和81位學生（7位教徒和74位非教徒）。教師及學生人數極少，基立學校作為天主教學校，發展空間日益萎縮，這個困境更成為日後教區結束基立學校，甚至是重建聖母聖衣堂的理由。

## 結語

本文的目的，是透過書寫灣仔進教圍的空間故事，了解這個曾經在香港存在的天主教城市社區，探討其興盛與隕落怎樣呼應香港的城市發展軌跡。藉簡述十九世紀天主教會在香港和灣仔的發展，我們帶出物業投資、土地發展與傳教工作自殖民初期的緊密聯繫。我們發現，教會在灣仔的物業投資，亦呼應整體維多利亞城在土地利用和規劃方面的發展軌跡。另外，我們透過歷史檔案和訪問，梳理進教圍的形成過程，也整理出煉靈堂（後稱聖母聖衣堂）的建堂過程。我們不僅澄清了一些對建堂歷史的誤解，更嘗試把其空間故事置於更大的地理尺度中理解，從而豐富本地教會發展史。我們更進一步，以進教圍的案例，探索二十世紀的香港城市發展，以及土地發展體制的形成過程，怎樣與一個天主教城市社區的興衰互相影響。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透過本文令讀者認識進教圍及星街一帶在香港城市及香港天主教舉足輕重的角色，以及其豐富的歷史地理，其空間故事不只是由發展商和政府合力建構的文化蘇豪區而已。

事實上，有關天主教在灣仔的空間故事還未結束。雖然進教圍在1970年代起已漸漸由社區轉變成一條街道的名字，但聖母聖衣堂依然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堂區。在1990年代中期，教區停辦基立學校後，便宣布聖母聖衣堂的重建計劃，把該地段售予發展商，重建成豪宅。在聖母聖衣堂重建的空間故事中，更可體現出土地發展體制的運作，當中牽涉教區、堂區、政府、發展商和社區等多個社會主體的互動。該空間故事不僅描述線性的市區重建過程，更是突顯空間和權力之間的辯證過程，尤

其涉及權威、談判、妥協、抗爭等在空間中的權力模式<sup>25</sup>。然而，那是值得另文再論的空間故事了。

[Abstract] It is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to tell the spatial story of St. Francis's Yard in Wan Chai from the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discussing how its rises and falls echo the urban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Hong Kong. Other than the life course in sociology and oral history in history, the methodology of spatial story in geography highlights the spatiality of processes. By putting spatial practices into narratives and closely linking the spatial setting and temporal sequence, spatial story is useful to analyse urban processes.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St. Francis's Yard in Wan Chai. Forming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St. Francis's Yard has been an urban community for Chinese laity. This article documents the everyday life in this urban commun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landscape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and thus uses it as a case to analyse how the land (re)development regime in Hong Kong has been formulated alongside the capitalist urban processes of Hong Kong.

---

<sup>25</sup> Allen, J., *Lost geographies of power*. (Malden, MA: Blackwell, 2003).